

【人物传记】

朱瑞墀：蹇命主席

杜雪巍¹

新疆民国“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执政时期，曾有刘文龙、朱瑞墀、李溶三人担任过新疆省主席，作为盛世才的傀儡。尤其是年已72岁高龄的朱瑞墀体弱多病，仅在省主席任上代理三个多月便溘然去世、撒手人寰了。

刘文龙被盛世才囚禁后，盛世才考虑到新疆官场文官系统的赓续，遂指派金树仁的姻亲财政厅厅长朱瑞墀接替刘文龙的省主席职务。

朱瑞墀在民国二年（1913年）任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营务，八月六日调任喀什噶尔观察使，一个月后又调任镇迪观察使；民国五年（1917年）1月正式出任新疆喀什噶尔道尹，之后调任阿克苏道尹，后调任迪化道尹；民国二十年（1932年）调任哈密行政长官兼任省军第一师师长，坐镇哈密。此后，其调任新疆财政厅厅长。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12月，其升任新疆省主席。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3月25日，朱瑞墀病逝。

一. 和田任职十余年

朱瑞墀（1862-1934），字凤楼，“清光绪朝廪生，1893年投效新疆军营，保捐通判。自1906年后，历任皮山、于田知县。”²也即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瑞墀投效新疆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任皮山、于田知县十三年间，最先出任的是通判一职，后任于田县知事、皮山县知事。《最近官绅履历汇录》记载说：朱瑞墀“安徽霍邱县人，廪生，新疆委用通判，皮山县、于田县，保升知府。”³明清两代将府、州、县负责按时发给衙署官员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叫廪生，也称呼廪膳生、廪膳生员。而同知、通判则是清代在府、州设置的官职。州同知也称州同，州通判也称为州判。“同知、州判又分为两种：一种作为府州的辅佐官，分理府州内各项事务；另一种不作为府州的辅佐官，而专管地方某项事务，均冠以某分管专职的名称。”⁴显然，朱瑞墀的“廪生，新疆委用通判”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他是府州的辅佐官。囿于新疆地方县府的人员、建置均不大，应该说于田、皮山县的大小事务，均由朱瑞墀处理。

笔者从新疆档案馆查得一份档案，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初四日，署理莎车府皮山县知县朱瑞墀给甘肃新疆镇迪兵备道兼按察使、陆军督练处参议官兼参谋处总办荣的一份报告：“有印度总督营务处匪勒顶入华，未带护照，犹恐到卡阻拦等。因奉此，即应遵行。于七月初一日，俄国都司坡罗夫措甫又图尔吉斯塘总督衙门委员安德徠衣等各执。”⁵此中透露出几个信息：1.是朱瑞墀1907年前后时任皮山县知县；2.“荣”即荣霈，时任新疆按察使；3.当时新疆与印度、俄罗斯的来往、纠葛，从未中断过。

朱瑞墀系光绪十九年（1893年）投靠新疆军营，当时朱31岁。那么在此前，朱瑞墀应该在其家乡安徽霍邱县。其家境普通，并非当地的名门望族。《霍邱县志》上说：欧阳修思颖后云，“其俗尚武稍习文辞，务俭勤农，知慕孝行，方輿胜览云，俗慕学、问才、产文武。霍昔属寿州，

¹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

² 魏长洪著：《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第416页。

³ 敷文社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最近官绅履历汇录》第一集（民国九年七月），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2月，第119页。

⁴ 《新疆通志》第15卷政务志·政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37页。

⁵ 自治区档案馆馆藏。



后属颖寿，颖之风俗，盖即霍之风俗矣。”¹凡事讲道理，尚武、重文，慕才。这便是霍邱的风俗、民情。在此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朱瑞墀，自然是一个珍惜自身前程，不是一个碌碌无为之人。他与安徽几个头面人物均交谊深厚。

二. 古城营务，议和代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瑞墀在皮山县知事任上，一直任到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地处新疆和田的皮山县，王朝更替的震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是那么平淡、无奇。

民国元年（1912年）1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无心任职于新政府，进而推荐了自己的安徽同乡袁鸿祐出任新疆首任都督。然而袁鸿祐却仅仅是名义上担任了新疆首任都督12天，便被哥老会党边用福等戕害。袁鸿祐故去，袁大化才不得已推荐了镇迪道提法使的杨增新出任新疆首任都督一职。

对于初登新疆都督之位的杨增新，一上任便赶上与伊犁辛亥革命党人的合谈。紧接其后的便是苏联人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原属于科布多部落的蒙古人即将脱离中国。杨增新为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集全新疆之力奋尔保卫阿尔泰地区及与之毗邻的科布多地区。

在此背景下，杨增新调任朱瑞墀任清政府前敌粮台，旋又升任为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议和谈判代表。议和结束后，当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并侵略科布多及新疆阿勒泰地区时，朱瑞墀奉杨增新之命出任援阿全军营务处兼办后路粮台。

民国二年（1913年），援阿事件结束后，朱瑞墀仍在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事务。朱瑞墀在一份书信中曾说，与张荫亭“北庭同事”，即同在古城，张任旅长²。这也佐证了朱瑞墀这一时期在古城营务处任职的事实。

民国二年（1913年）8月6日，朱瑞墀被新疆财政局商调赴喀什噶尔任观察使，一个月后又任了镇迪观察使。在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颁布的任命命令中，可见八月六日任命朱瑞墀职务令“任命朱瑞墀署喀什噶尔观察使。未到任前，由张应选护理。”³九月五日“任命朱瑞墀署新疆镇迪观察使。”⁴

民国五年（1917年）1月，朱瑞墀再次被任命为喀什噶尔道尹一职。观察使亦相当于道尹级别，只不过观察使系钦差、乃虚职，而道尹则是实缺。杨增新先派朱瑞墀赴喀什道、镇迪道巡视一遭，可理解成杨增新对朱瑞墀才能的考核，然后才正式任命朱瑞墀担任喀什噶尔道尹。杨增新之所以让朱瑞墀出任喀什噶尔道尹，显然是看重他有着在皮山、于田任过通判、知县的长期工作履历及经验。1912年新疆伊犁也爆发了辛亥革命起义，清政府最后一任伊犁将军---志锐毙命。遵照中央政府命令，新疆省府与伊犁革命党人合谈组建新疆联合政府。合谈成功后，伊犁革命党人杨缙绪被杨增新任命为喀什噶尔提督。杨缙绪没有到省府迪化，而是从伊宁直接到了喀什噶尔接任提督一职，从而避开了杨增新的暗杀图谋。

也即在朱瑞墀到任喀什噶尔的前一年，1912年6月21日，于田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策勒村事件。由于1912年初伊犁辛亥革命的爆发，沙俄以保护其使领馆和俄商为名增兵喀什噶尔和伊犁。1912年5月，沙俄向新疆伊犁派出200余名哥萨克骑兵进入伊宁；6月又派出800多名士兵

¹ 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0）之《同治霍邱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2页。

² 冯天琪，冯天瑜编：《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9页，“朱瑞墀致荫亭旅长”。

³ 《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64页，23--897. 任命朱瑞墀职务令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六日。

⁴ 《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428页，23--1438. 任命朱瑞墀职务令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五日。



进入喀什噶尔。为企图长期占领新疆，沙俄在南疆和阗、莎车、叶城一带大肆煽动之居民加入俄籍，且操纵所谓“俄侨”闹事。在于阗发生的策勒村事件就是因为“俄侨”胡作非为而引发的。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而地处英、俄势力角逐的新疆南疆形势也处于异常复杂且敏感的时期。正是因为清王朝覆灭，过去的行政体制及官制均发生变化。袁大化离开新疆前，曾推荐在喀什噶尔任道尹的同乡袁鸿祐接任新疆都督一职。可就在袁鸿祐志得意满准备赴迪化接替都督一职前，1912年5月7日，袁鸿祐夫妇及参将汤殿臣、疏勒知府张秉铎、革员张舒锷等被以哥老会首领边用福和魏德喜等人悉数枪杀毙命。袁鸿祐毙命后，袁大化只得推荐镇迪提法使杨增新接任了新疆都督兼民政长职务。5月18日，杨增新任命自己的女儿亲家王学曾任喀什噶尔道尹、周至德任疏附县知事。7月底，杨增新又派王炳堃任喀什道尹，命其拿出处理哥老会的办法。“1月10日，新疆各道道尹改称观察使”¹，也就是说，1913年8月6日，中央政府任命朱瑞墀为喀什噶尔观察使，即“免王炳堃，调朱瑞墀代理喀什噶尔观察使，至9月5日调离，再命常永庆代理喀什噶尔观察使。”²朱瑞墀赴任喀什噶尔观察使及调任镇迪观察使，很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因为当时喀什噶尔的形势的确也十分危急。策勒村事件引来沙皇俄国出兵新疆，形势呈剑拔弩张状态，加之哥老会戕杀南疆地方官事件频发，的确头绪纷繁复杂。

因为辛亥革命出现的朝代更迭，新疆北部爆发科布多战火；同时伊犁的辛亥革命，志锐毙命，革命党人起义成功，省府与伊犁革命政府亟待合谈；而南部一方面哥老会党在戕杀地方官员，另一方面震惊中外的策勒村事件爆发，另有英、俄借保护其领事馆及侨民，纷纷插手南疆地方，局势错综复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朱瑞墀上任喀什噶尔观察使，进而再任喀什噶尔道尹的。

当时的于田县策勒村，即是今天的策勒县策勒村。所谓“俄侨”色依提·阿吉原籍新疆和田，自称中亚安集延人。十五六岁时流落塔什干加入了俄籍，约1907年4--5月份以经商为名窜回策勒村。在策勒村，色依提勾结当地富商阿不列孜卡热，与其女结婚。色依提以阿不列孜卡热的宅院作为据点，随意关押吊打当地民众，蹂躏当地妇女，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色依提在沙俄领事馆的授意下，大肆发展当地农民加入俄籍。策勒村仅有村民3000余人，加入“俄侨”的便有200余人，还成立了“俄侨组织”。色依提带领这些“俄侨”私藏武器，对抗官府，抗租抗税，拒服徭役。他们还霸占当地的水源地，兼并土地，垄断市场，任意盘剥当地百姓。

对于不愿意加入俄籍的策勒村村民，色依提等人是随意吊打。策勒村广大村民对色依提等人是深恶痛绝。1912年2月，以苏朴尔为首的17位村民前往下田县衙状告色依提等人霸占水源，强迫村民加入俄籍等罪状。色依提闻讯后反而带领一群“俄侨”骑马闯入县衙，于田县衙遂将色依提关押起来。喀什噶尔沙俄领事闻讯后，迫便于田县衙将色依提交由喀什噶尔去处理。色依提一到喀什噶尔便进入了沙俄领事馆，3个月之后以人证不齐放回了策勒村。

从此色依提更为猖狂起来，当年6月中旬，色依提等人再次吊打了村民买买提赛依提和杜尔格伯克。策勒村村民也再次到喀什噶尔状告色依提等人的罪行，当时哥老会首领边用福和魏德喜在喀什噶尔掌握实际权力。他们指派莎车参将熊高升及其助手赵大胜30人前往策勒村处理纠纷。色依提等人没有将熊高升放在眼里，非但拒绝传讯，还公然在其居住的宅院挂起了沙俄国旗，且聚集起上百人，宣布与熊高升开战。

6月23日，色依提一伙打死了前来传令的士兵周树堂，用刀劈死了村民衣斯拉木。色依提等人的暴行激起村民的极大愤慨，500余人迅速包围了阿不列孜卡热宅院，进行血战。除色依提及其亲信化妆逃脱外，其余30余名歹徒皆被村民击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策勒村事件”。

事件发生后，沙俄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沙俄政府向北京袁世凯政府进行抗议，袁世凯遂电令

¹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85页。

²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86、1087页。



杨增新责令喀什提督焦大聚、道尹王炳堃向沙俄道歉，边用福调离喀什，严惩所谓“罪犯”。

1913年2月下旬，对策勒村案件的审理在喀什噶尔开庭。8月，喀什噶尔提督杨缵绪与沙俄达成了屈辱协议：喀什道尹王炳堃、和阗知州唐允中、于田县令沈永清撤职并罚款；熊高升被判处12年徒刑，赵大胜判服苦役6年，苏朴尔等40余村民分别叛服苦役4--14年。10月，双发签字结案。

三. 朱瑞墀任喀什道尹

1913年8月6日，朱瑞墀上任喀什噶尔观察使时，策勒村事件还未结案。而在此之前的1913年1月28日，杨缵绪自伊犁抵达喀什，以陆军中将衔任喀什提督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

在这一时期，沙俄与英国均在喀什噶尔地区大肆发展自己国家的所谓“侨民”，寻找自己在当地的代理人。沙俄通过策勒村事件大肆扩充自己的势力，英国也通过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继业“诱使各地来喀什的615名中国人非法加入英国籍”¹。

杨增新首先是先努力救平与英、俄之间的外交纷争，先为新疆争取一个平稳、安全的外部环境，而后再腾出手来处理新疆的内部事务。杨增新对内则是尽快消除因为哥老会戕杀地方官事件所带来的各种隐患。

1917年1月，朱瑞墀再调喀什噶尔任道尹，其认真履行杨增新交付的各项指令。“6月5日，杨增新令喀什道尹朱瑞墀，自喀什前往俄属奥什、安集延做工之华侨所得工资不敷糊口，此等应对出国做工人数限制。”²“9月25日，就喀什道属商民冒充英裔一事，朱瑞墀奉命照会英总领事马继业，切实声明以后英商约不得私出护照包庇不法华商；如有与华商合资营商之事，应照华商一律纳税。”³朱瑞墀任喀什道尹的时候，杨缵绪已辞去喀什噶尔提督一职，返回内地，杨增新遂派喀什噶尔回城副将杨得胜继任了喀什噶尔提督一职。1915年12月2日，回营统领马福兴率20余营进驻喀什。所以朱瑞墀是与马福兴即先后抵达喀什噶尔为官，二人显然是认识的。但马福兴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人。马福兴在杨增新接任新疆都督时出过大力，杨增新为安抚马福兴让其赴任喀什噶尔做了提督，1916年5月22日晋升马福兴为陆军中将衔。1918年3月31日，喀什提督马福兴加陆军上将军衔。在俄国国内爆发革命时，马福兴曾积极建议杨增新要求带兵赴俄国帮助白俄残匪一事，被杨增新严词拒绝。马福兴后来积极与北京方面联络，欲取代杨增新新疆都督一职，终于被杨增新发觉并铲除，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1917年3月27日，朱瑞墀在给时任新疆教育厅长的张馨（1898-1940，字敬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喀什文武、中外历前任，久不相睦，此中细节，一言难罄，若两方面有一方能识大体者，决不至于如前之决裂。弟到任后，比即以中外多事，推诚相布。嗣后均当确守范围，和衷共济。近月以来，所有一切，尚称相安；新疆喀什动乱，英、俄借机干涉；北洋政府拟对德宣战，新疆与英、俄、德关系微妙；俄国发生革命（当指二月革命）、俄国沙皇逊位。”⁴从中可以看出：朱瑞墀对喀什时局，以致动荡的新疆局势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表现出一幅忧心忡忡的面孔。

1917年7月11日早晨，中华民国前往喀什调查新疆财政状况的谢彬到达喀什，见到了朱瑞墀。谢彬在《新疆游记》里写道：“朱道尹以此间官粮价格，较喀什市价为廉，特函购千石备署食，亦两利之道也。”⁵

¹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86、1087页。

²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0页。

³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0页。

⁴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⁵ 谢彬著：《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54页。



因没有朱瑞墀本人的过多记述，笔者仅能从杨增新给喀什道尹安排的各项指令中去寻找朱瑞墀在喀什噶尔任职时的一些轨迹与线索。“喀什道尹朱瑞墀派遣依不拉音阿洪为塔什干交涉员，与安集延华商总阿不都拉、傲什华商总马木提、纳林华商总米尔牙合甫及突厥斯坦调查员兼喀什道署审译赖豪等人，前往俄属中亚各城调查华侨受害情况，对俄方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华侨在俄利益，迫使俄方认错赔偿。”¹“又令朱道尹照会俄领事，诘责索赔，并据情呈报北京与俄国公使严重交涉。”²

1918年8月5日，俄国国内大乱，俄国驻华公使退出。杨增新电令朱瑞墀，“以后旅俄华侨如有损失，可由华商就近要求赔偿，一面呈由当地地方官与中国驻俄领事交涉。”³1919年2月14日，杨增新电令朱瑞墀：“如果俄国共产党派人要求来喀什通商，就要求他们不放白俄败军和难民入卡。”⁴10月18日，俄驻喀领事照会喀什朱道尹，“有俄旧党少将穆哈诺夫等一行数人，欲自伊尔克什塘卡入喀什购买冬衣，请令放行。杨增新电令拒绝。”⁵

中国国内遭逢晚清覆灭、民国新立的辛亥革命风暴之时，苏联也刚刚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随后开始的消灭私有制、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大批惧怕私人财产被强行剥夺的哈萨克人纷纷逃到新疆，进而又引起新疆政治局势的动荡。

1919年冬天，当杨增新闻知在俄属奥什、安集延等地的维吾尔华侨有“一千五六百人，杨增新令朱瑞墀带银5000两前往救济，并接归500余人，在伊尔克什塘卡又被俄方任意搜索百般刁难。”⁶

1921年3月16日，杨增新令朱道尹：“自4月1日起，所有在新英商，应照俄商一律完纳进出口税，以照公允而挽国权；所收关税，仿照张家口征收俄货税之例，作为新疆省边防军费，并将富余部分用以回收新疆省发出的纸币。”⁷

1922年9月26日，朱瑞墀调离喀什噶尔，赴任阿克苏道尹。

四. 阿克苏行政长

从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中，笔者看到《指令阿克苏道尹朱瑞墀禀拟令布民斫伐枯柴以供军用》⁸、《训令喀什杨道尹阿克苏朱道尹准外交部电覆由地方官与俄领交涉仍应斟酌办理文》⁹、《电阿克苏朱道尹瑞墀等俄官所拿良民三人准其解乌并代为办护文》¹⁰、《指令阿克苏朱道尹应由喀什道尹照会俄领收回哈并饬乌什县查明人口地方文》¹¹，这四份文牍的日期皆是民国五年四月至民国六年1月（1916年4月至1917年1月）间，朱瑞墀任阿克苏道尹期间发生的事。但依据朱瑞墀的简历，这段时间朱瑞墀还未调任阿克苏道尹，六年后的9月26日他才赴任，显然又系《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作者记述有误，或者可以理解为：因阿克苏毗邻喀什噶尔地区，杨增新显然是调任朱瑞墀去阿克苏后，是鉴于苏联在喀什噶尔驻有领事机构，便与协调数十万逃往新疆的哈萨克人等事宜，又调朱瑞墀回任喀什噶尔道尹一职。

因俄国十月革命前在中亚哈拉湖一带强行征兵，激起哈萨克民众反抗，约三十万哈萨克、布

¹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1页。

²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1页。

³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2、1093页。

⁴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2、1093页。

⁵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3页。

⁶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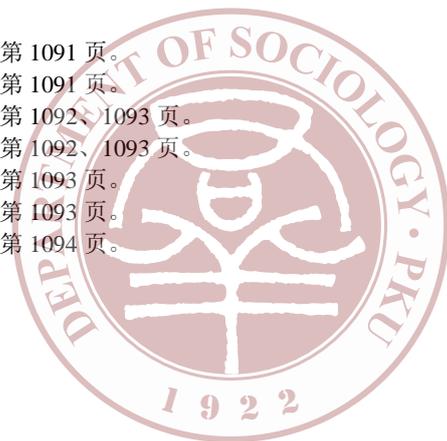
⁷ 王时祥著：《喀什噶尔历史文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094页。

⁸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已集上，民国五年十一月三日，第1905页。

⁹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已集上，民国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918页。

¹⁰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已集上，民国六年一月九日，第1947页。

¹¹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已集上，民国六年一月九日，第1947页。



鲁特部落纷纷逃到毗邻的新疆。这一时期的新疆，毗邻沙俄边境的新疆各个山口，边卡均集中了数万准备进入新疆的哈萨克人和布鲁克人。

刚刚将科布多部分领土并入新疆阿勒泰之后的杨增新，多次电令朱瑞墀，俄民若进入新疆，均悉交出枪械以难民身份进入，进行接济。同时杨增新派人与俄领事交涉，将逃入新疆境内的难民全部分批遣入其境内，以消除边境冲突。“现在俄国虽弱，以抗拒各国则不足；以抵制新疆则有余。”¹

杨增新指示朱瑞墀与苏联驻喀什噶尔领事密切沟通，解除哈萨克人的后顾之忧，分批分批的将逃往新疆的哈萨克人遣送回国，以消除边境隐患。

朱瑞墀任阿克苏行政长期间，金树仁亦正好在阿克苏任库车等县知事，二人算是同事。也由此，朱瑞墀在阿克苏任行政长期间与金树仁结成了儿女亲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金树仁的儿子。因为金树仁乃杨增新的学生，所以后来杨增新调任金树仁任省府军政务厅厅长一职。当杨增新“七七事变”毙命后，金树仁当上新疆省主席。其随后便将姻亲朱瑞墀从阿克苏调赴省城，任了省财政厅厅长一职。

此处有一则1930年3月初十日朱瑞墀给金树仁商议女儿婚期的档案：“喜期拟定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查五十一两月俱系大利月……”²

还未及朱瑞墀的女儿举行婚礼，因为马仲英的突然进疆，打破了新疆的权力平衡。正因为金树仁的志大才疏，新疆一时间出现了张培元据守伊犁，马仲英进入新疆，三方势力角逐的激烈态势。

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中说：1931年“3月间调令阿克苏区行政长朱瑞墀带兵前往镇压。”³大兵压境，“暴动农民提出和平解决，朱瑞墀则坚持严惩暴动祸首，并枪杀了洽谈代表”，继而又起而反抗，省府失去了平息暴乱的机会。”此后，朱瑞墀调任新疆财政厅厅长一职，并帮助剿灭马仲英一伙进疆匪徒。

马仲英攻打哈密城时“新、老两城由朱瑞墀、熊发有旅把守，在马部猛攻下，旅长熊发有难以支准备投降，被朱瑞墀制止。”⁴

“四·一二政变”后，金树仁失去新疆省主席权力，匆匆逃亡塔城，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南京。“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凭借手中握有的兵权，攫取了新疆边防督办的实际权力。盛世才表面上倡导军民分治，自己仅是手握兵权的新疆边防督办，省政府主席则由推选出来的教育厅长刘文龙担任。

1931年11月7日，朱瑞墀调任省财政厅厅长。无奈朱瑞墀“被病缠磨已久，体气愈弱。昨据苏领馆医生所言，心血遇亏，如能得两三星期静养、服药则可无全收效等。”⁵

五. 朱瑞墀与张荫亭

在冯天瑜所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一文中，说到朱瑞墀与张荫亭之间的关系。其中一封有朱瑞墀写给张荫亭的书信，“荫亭旅长乡台麾下：同事北庭”。显然，张荫亭与朱瑞墀是安徽同乡，朱瑞墀在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时，张荫亭时任旅长一职。冯在文中还介绍了这位张荫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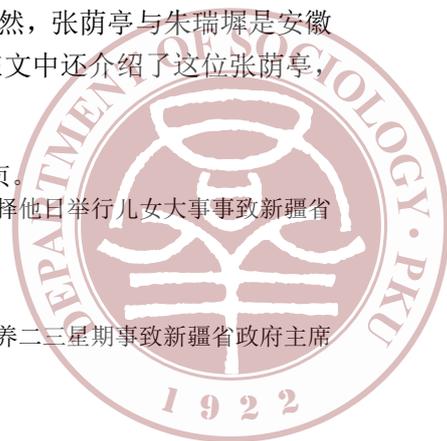
¹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癸集七之《电马提台福兴勿派兵赴俄文》，第3576页。

² 新疆档案馆政002--002--0981--002之“朱瑞墀为电请陈耐庵转求即就五月内再择他日举行儿女大事事致新疆省主席的呈”，民国19年3月10日。

³ 蔡锦松著：《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47页。

⁴ 蔡锦松著：《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50页。

⁵ 新疆档案馆政002--永久--002--0738—050，“新疆省政府财政厅朱瑞墀为请休养二三星期事致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的函，民国22年8月12日”。



他系辛亥革命后皖系的大通绅商，多主政新疆、陕甘等地。文中介绍说：“1912年3月《民立报》云：张荫亭等大通绅商联名通电北京袁大总统（袁世凯）、南京孙大总统（孙中山）及上海各报馆等，请求留任黎宗岳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1876-1915），武昌起义参与者，武昌起义后被任命为长江各军参谋长，1912年1月，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黎宗岳任大通军政分府都督。4月，南京政府命令各地取消军政分府，黎宗岳拒绝执行命令，安徽都督柏文蔚命胡万泰出兵大通，击败黎宗岳。”¹由此可见，张荫亭也非一般等闲人物。

在当时的民国新疆政府中，朱瑞墀有好几位同乡、密友，首位便是潘震（1851—1926），安徽当涂人，任新疆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后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其次是汪步端（1858-?），安徽当涂人，民国建立后塔城首任道伊。

朱瑞墀曾在给张荫亭的信中说：“中德已失感情，驻京德使已离北京。此件关系绝大，不无可虑。英、俄两领得此消息，固属得意，而我之对待更形棘手。刻间俄领来署密告，言该俄皇现已逊位，彼京亦颇有风潮。印度亦叠起叛乱，英领已照会前来”²，均可睹见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辛亥革命后，朱瑞墀与张荫亭“同事北庭”，时有乡关之思，而又相互慰藉：“我先在省想蒙督军慰留，不许出省，而南疆之盼望者尤多，时局艰难，尚望免任其难，共维大局。关内人心不靖，旋里一节，暂可不必作此计议也。”³

朱瑞墀对张荫亭有“勋高一代望重三边”的赞语。可见这位荫亭旅长的人缘与声望。周务学的信函中更是对张荫亭异常恭敬：“久钦鸿范，沐惠露之均沾。远隔龙门，荷仁风之渐被。结蚁私于两地，徒螯戴夫三山。敬维荫亭旅长大人鼎被云蒸，泰祺日丽，仰见金汤巩固。”⁴“弟忝摄道篆，时形愚拙，惊心岁序，虚掷驹光。”⁵周务学1918年任新疆阿尔泰道尹，1921年白俄窜犯阿山，城陷，自戕殉国。可以推测这封信大约写于1917到1920年间。

六. 出任省主席

朱瑞墀被盛世才指定为省主席以后，“朱每天坐马车上省府办公，前面用一人手托大印，用红布包裹，在舆前昂然而行，怪相殊堪捧腹，实际此印乃木刻摆样，省府之大印由盛私行保管盖用。”⁶蔡锦松给我们描绘的朱瑞墀这番迂腐滑稽模样，这也仅是朱的其中一幅面孔，其中还隐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其他内容。也就是说，朱瑞墀早就看透了盛世才的真实目的，仅仅拿他当做一个木偶，一个傀儡而已。

民国22年（1933年）12月25日，新疆省主席刘文龙或是被软禁以后，“文龙年逾六旬有六，精力衰颓，前患头晕……拟请病假一个月以资调理，所有省政府主席职务并请以盛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朱瑞墀代折代行。”⁷刘文龙被盛世才软禁以后，1933年12月，盛世才指定朱瑞墀为新疆省主席，直到1934年3月5日朱瑞墀去世。而当年《大公报》（天津版）根据驻新疆记者李天织的报道说：1934年“三月二十五日省府代理主席朱瑞墀逝世，二十七日省委会议推李溶暂代”⁸省主席。或许是后者的记载更为准确些。

朱瑞墀去世后，盛世才又指定迪化区行政长官李溶为省主席。李溶与朱瑞墀一样年迈，一切均

¹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²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³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⁴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⁵ 冯天瑜著：《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005版。

⁶ 蔡锦松著：《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37页。

⁷ 新疆档案馆政002-永久--002--0693--041“新疆省府主席刘文龙为拟请病假一个月调理身体所有职务以朱瑞墀代理事致南京国府行政院，民国22年12月25日”。

⁸ 魏长洪著：《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第416页。



由盛氏支配，办公时间，每日由盛氏酌拨一些一些简单例行公文数十件交李，而李溶也从不审核只是依样画圈而已。1940年3月21日，李溶病逝后，盛世才便自任新疆督办兼省主席，彻底丢开了军民分治的外衣。

金树仁也没够保证姻亲朱瑞墀一家人的荣华富贵，随着“四·一二政变”的发生自己也匆匆仓惶逃亡内地。而因为朱瑞墀的过早离世，其一家人的生活也顿时落入谷底。

七. 朱氏遗产

朱瑞墀的姻亲金树仁匆匆逃亡关内，落得个身陷囹圄的结局。也因为朱瑞墀的过早故去，将麻烦留给了朱氏后人。

朱瑞墀在任省财政厅厅长时，曾为办理五公子赴欧洲留学事，向蒋任氏借得黄金100两购买飞机票事宜。“四·一二政变”后，金树仁逃回内地、朱瑞墀故去，省府会议曾以折发省票给蒋任氏折抵朱氏所借黄金，但蒋氏却拒不认领，非要将朱瑞墀的夫人余佩贞告上了法庭。诉讼纠缠多日，直到1945年10月13日，吴忠信接任省主席时，吴才批示说：“将来该案由省政府负责，与氏无干，俾氏得以自由回兰州。公家之事，自有公家负责，幸勿遗累后人。”¹

亦正因此案，使得孤儿寡母余佩贞一家人迟迟难于离开新疆。“拟奉夫君朱瑞墀及家属等灵柩运回兰州等情，前曾呈明在案。兹由舍亲孙福坤护送灵柩三口，及女眷四人，并带老厨役一名，理合检同相片各二张随文呈请钧座鉴核俯准饬发晋关护照以便整装首途，实为公德两便。谨呈新疆省主席吴”²。

笔者在查找朱瑞墀档案室，竟发现清查朱瑞墀身后财产的一则档案，即“迪化清理财产委员会勘鉴申其清调电悉查朱前主席遗留产业：七里桥荒地五十亩房三间；东门外花园一处地约六十亩，房二十五间，树（106）棵园林经专署代蕴其地未荒芜无人耕种，惟房屋年久失修均破坏不堪……”³。

就此，笔者也还原出了朱瑞墀的完整履历是：朱瑞墀（1862--1934）安徽霍邱县人，字凤楼。清光绪朝廪生，1893年投效新疆军营，保捐通判。自1906年后，历任皮山、于田知县，保升知府。民国二年（1913年）8月6日，朱瑞墀被新疆财政局商调赴喀什噶尔任观察使，一个月后又任了镇迪观察使。民国五年（1917年）1月，朱瑞墀再次被任命为喀什噶尔道尹一职。1922年9月26日，朱瑞墀调离喀什噶尔，赴任阿克苏道尹。1922年9月26日，朱瑞墀调离喀什噶尔，赴任阿克苏道尹。1931年11月7日，朱瑞墀调任省财政厅厅长。民国22年（1933年）12月25日，1934年3月25日朱瑞墀去世，享年72岁。

¹ 财 001--永久--001---0898--008 “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为呈请前主席之妻余佩贞呈以伊夫在在真挺长任内为公家借用蒋任氏黄金购买飞机嗣经省务会议折发省票该蒋任氏不肯具领控经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业经该民上诉于最高法院处裁析鉴核示遵事致新疆省财政厅的指令。民国34年11月。”

² 新疆档案馆财 001--永久--001---0898---006 “新疆省政府前主席朱瑞墀之妻余佩贞恳求紧急作主以便行路事致新疆省政府主席，民国34年11月8日”。

³ 新疆档案馆：民国35年9月25日，朱瑞墀档案682号。



新疆建省的划时代意义

杜雪巍¹

清光绪十年（1884）11月19日，清廷正式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宣告了新疆省的正式成立。这对新疆而言，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天，也是新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新疆建置行省、郡县制在新疆全境的得以推行，将新疆与全国各省在行政体制上统一了起来。新疆建省，密切了新疆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情谊，更加速了新疆建设与发展的步伐。

一、历史的发展

地处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是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的必经之路。历史上，人们都把它称之为“西域”。自从西汉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刘彻为联络月氏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汉太初四年（前101），西汉在西域设置了“使者校尉”，管理西部的屯垦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官吏。汉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在西域的乌垒（今轮台县东策大雅）设置了“西域都护”，正式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统治。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央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是时断时续，但每一次重新建置都是越来越强化，越来越牢固。

郡县制始自我国春秋（前770-前476）时期，而之前的西周时，大小城堡都称之为“邑”，或一城则是“一国”。春秋初期，秦、楚等国在新兼并的地方设立县，直接隶属于君主。春秋中期以后，设立县的国家逐渐增多。春秋末期，“郡”首先在晋国开始出现。“郡”是一种地方制度，官位比县低；后来郡的地位提高了，“县”受“郡”的统辖。郡县不同于过去封建卿大夫的封邑，它加强了国君统治地方的力量，解构了原有的封建分封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各国都普遍采用了郡县制。秦（前221-前206）统一六国之后，郡县制由成了历代相沿袭的一种制度。郡县制非常有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各国封建君主均采用了这种制度。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更替过程中，虽然分裂与统一一再交替出现，但郡县制度却得以保留存在了下来，甚至扩展到了边远的西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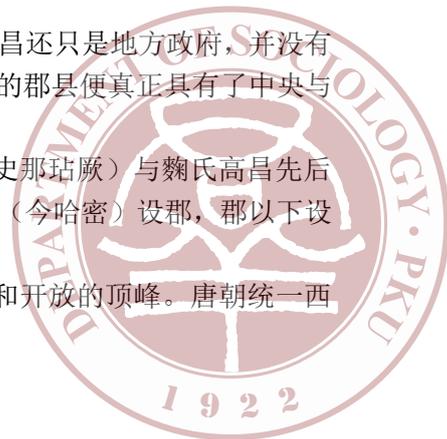
东晋（317-418）十六国时期的前凉（314-376）太元四年（327），前凉在西域设置了高昌郡，即今天的吐鲁番高昌故城。高昌郡隶属于沙州（今甘肃敦煌），下辖田地、高昌、横截、高宁等县，县以下设乡里，所设官职一律沿袭了汉晋以来的职官制度。这也是西域最早的郡县制制度。此后，麴氏高昌（499-640）也实行了郡县制，“在交河、田地、南平、横截等郡，郡以下设置县，已知的县名达十余个，郡县制统辖的范围比前凉更大。”^[1]

尽管郡县制在西域得以推行，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前凉和麴氏高昌还只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体现出中央和地方的统治关系。及至隋、唐、元、清等朝在西域设置的郡县便真正具有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了。

隋朝（581-618）统一全国后，西域的西突厥头领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与麴氏高昌先后表示臣属，隋朝政府便在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设郡，郡以下设立显武、济远、肃宁等县，同时还设立西域校尉管理西域各种事务。

唐朝（618-907）的建立，将中国封建王朝社会推到了一个繁荣和开放的顶峰。唐朝统一西

¹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新疆文史》执行副主编。



域南北疆以后，在西域实行了两种统治制度：一为州县，一为都护府。如在伊州，治所在伊吾（今哈密），管辖伊吾、纳职（今哈密西拉布楚克）、柔远（今哈密东格子烟墩）3县；西州，治所在高昌，下辖高昌、柳中（今鄯善西南鲁克沁）、交河（今吐鲁番西北交河故城）、蒲昌（今鄯善）、天山（今托克逊）5县；庭州，治所在北庭（今吉木萨尔北），下辖金满（今吉木萨尔破城子）、轮台（今乌鲁木齐米东区一带）、蒲类（今巴里坤）、西海（今沙湾安集海）4县。与此同时，又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治所初在西州，后迁至龟兹，辖天山南路到葱岭以西广大地区）与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管辖天山以北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等地区）。两大都护府下辖都督府若干，都督府以下又各管辖州若干。三州与两大都护府在唐王朝在西域的地方政府管理机构。

在元代蒙古统治西域时期，西域也曾有过行省的建置。蒙元时期，（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忽必烈继位后改成元朝1271-1368）。蒙古统治西域时期，宪宗元年（1251）在今天的吉木萨尔建立了别失八里行尚书省。至元八年（1271），元朝又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西北）改设了行中书省；同时设立了北庭都护府（驻别失八里）、斡端（今和田）宣慰使、元帅府等行政机构，统辖西域各地。行省制度是元代开始实行的，它在西域的行省与内地不同，其没有以郡县制作为支柱和基础，故缺乏生命力作为保障。

明代（1368-1644）时期的西域，大部分地区仍处在蒙古贵族察合台后裔的统治之下，中央政府只是在哈密设置了卫所进行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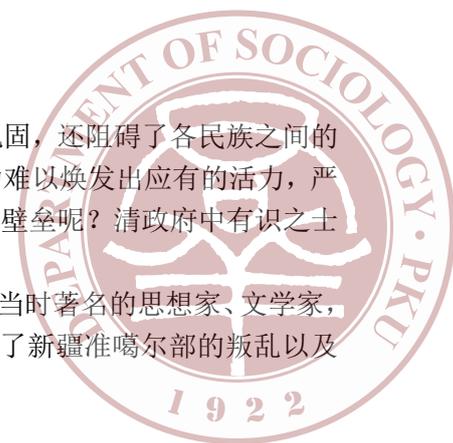
清代（1644-1911）乾隆皇帝平定西蒙古准噶尔部封建贵族的叛乱及南疆维吾尔伊斯兰教大小和卓木的分裂叛乱之后，统一了西域全部地区。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西域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治所伊犁惠远城（今霍城县南），对西域实行军府制统治，下辖各地参赞、办事及领队大臣，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军府制的特点是：只管军事，不管民事。民政事务采取“因俗施治”的原则交由各民族头领管理。如在蒙古族牧民聚居区根据分封世袭的王、公、台吉等爵位实行扎萨克制度；在维吾尔民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度；在哈密、吐鲁番地区的头领，因为他们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建有功勋，也实行扎萨克制度；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针对回、汉移民众多的特点，则设置州县，即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管；哈密地区，因靠近甘肃省，故隶属于甘肃省安肃道管辖。

总之，清政府对于西域地区的统治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式。在靠近甘肃省的哈密地区，采取郡县制的方式；对于其他郡县制无法实行的地区则委托当地民族的头领管理当地民政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是剥夺了中央政府在当地的权威。而当地民族头领，一旦自身实力膨胀，或者赶上中央统治势力削弱，外来势力参杂其中，势必形成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由此，他们举旗造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清代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的同时，对于北疆聚居的蒙古民族和聚居南疆的维吾尔民族，“都是众建而分其势，不允许存在一个全民族的总头目”^[2]。这是清代有别于其他朝代统治新疆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对于地方行政制度的不统一，却仍要沿袭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所以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的推行，来解决这一矛盾。

二、建省的提出

新疆行政制度的不统一，不仅妨碍了清政府在新疆统治地位的巩固，还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更阻碍了新疆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且生产力难以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人为设置的藩篱和壁垒呢？清政府中有识之士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早就提出了新疆建省的主张。

首先提出新疆建省的人要数当时的著名学者龚自珍了。龚自珍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仅是一个进士出身的小京官。当时嘉庆二十五年（1820），乾隆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及



粉碎了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分裂行径后逃亡国外的大和卓布拉尼敦的孙子张格尔，在中亚浩罕国封建君主的支持下，侵入新疆南部。由此清廷朝野内外便出现了乾隆皇帝统一西域的种种非难。因为事关国家统一大业，龚自珍便著文《西域置行省议》，用一系列事实歌颂了乾隆平定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功绩。他针对各种对乾隆皇帝的非难说道：“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旗绿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3]此后，龚自珍在其《御试安边绥远疏》中，针对一些昏聩官员的“退保九边”的主张时说，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4]为此，他提出，正因为西域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而可以以免纳二十年地丁钱赋的优惠办法吸引内地农民去西域开荒、屯垦。

龚自珍用历史事实驳斥了反对统一西域的论调后，又提出了在西域建立行省的主张。龚自珍建议在伊犁设置总督，在乌鲁木齐设置巡抚，天山南北两路共设置 34 个府州。其中镇西（今巴里坤）、迪化（今乌鲁木齐）两府州已建 5 个县之外，其他 12 个府州需建 46 个县。建省以后，对哈密、吐鲁番两处郡王赏给府事官名号；对各地各级伯克遴选一人赏给协办县事名号，他们的地位可在道府与知县治下。龚自珍后来又著文提出，剥夺伯克之权的建议。因为当时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主要伯克的品级都比知县要高，建省、设立道府州县，如何安置王公贵族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新疆北疆地区的蒙古族王公台吉，龚自珍主张保留其封爵顶翎，去掉其例贡，向政府交纳牲畜。其目的仍是削弱他们的权力，提高地方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

然而毕竟龚自珍的官阶太低，人微言轻，他的在西域建省的主张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张格尔三次入侵新疆遭遇失败后，浩罕国又唆使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率领浩罕军侵入南疆。道光皇帝命扬威将军长龄出关前往镇压，并筹划新疆的长治久安之策。道光十一年（1832），事件平息后，曾任过伊犁将军的长龄上奏清廷，建议在新疆南疆设立同知、巡检等文官。他提出此建议的目的，是将伯克手中的权力收归到地方官手中来。此建议虽然没有直言在南疆设立郡县制，但本质上趋于一致。但此建议，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龚自珍、长龄的意图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阐述如何维护与加强清王朝的统治着眼的，也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潮流。

但从当时的国内情形而言，扎萨克制和伯克制具有封建制度早期的特点，徭役制在剥削方式中占主导地位。乾隆时，他曾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伯克的世袭、禁止宗教干预行政、规定伯克的品级、限制伯克拥有土地与拥有农奴的数量等。但伯克的统治权力受到清政府的保护，使他们脱离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干涉和控制。但是这些伯克却利用各地驻扎大臣不理民事的机会，私自扩大土地与农奴的数量，无疑就加重了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与伯克之间的阶级矛盾。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南疆持续发生维吾尔族农民聚众抗差、求免徭役的斗争。咸丰五年（1855）库车农民迈买铁里等赶赴伊犁，向伊犁将军控告当地伯克的苛敛无度。两年后，迈买铁里便领导库车农民武装起义，要求取消伯克和阿訇。同治三年（1864），受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库车再次爆发农民起义，并迅速蔓延至天山南北的各地农村。此次库车农民起义，也是从反抗徭役开始的。库车当地的爱玛特郡王、阿奇木伯克库尔班和另外 7 名伯克，以及清朝大臣等官吏均在本次农民起义中丧生。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19 世纪中叶，以伯克制为代表的徭役制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广大维吾尔农民迫切要求铲除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禁止宗教干预行政，削弱了宗教人士的权势。这又使得伊斯兰宗教上层人士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扮演起了宗教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角色，向清政府统治发动“圣战”。各地的伯克往往又被视为替异教徒办事的叛教者，同异教徒一起遭到杀戮。而宗教上层人士则借助农民起义的群众基础，一跃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的领袖。库车的阿訇热西丁和卓是这样，和田的宗教法官哈比布拉也是这样，乌鲁木齐回族阿訇妥得璘也是这样。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争夺统治地盘，又相互征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农民起义战争。维吾尔族王公伯克也再一次在

农民起义的战争中遭受沉重打击。

各地割据势力相互攻伐，彼此削弱自身力量的时代背景下，同治四年（1865）初，浩罕军官阿古伯挟持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侵入新疆。阿古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两年时间便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城镇。到同治十年（1871），阿古伯又占据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同一年，沙俄也趁火打劫占据了新疆伊犁。

光绪二年（1876），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左宗棠派刘锦棠为西征先锋，刘锦棠率部仅用了一年半时间便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阿古伯暴死于库尔勒，其两个儿子相互火并，余众亡命俄国。光绪七年（1881），宗宗堂抬棺入疆，欲誓死收复伊犁。后通过谈判，订立《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割地赔款，沙俄交回新疆伊犁东路。

十多年的动乱，新疆广大农村的社会动荡及旧的统治基础早已崩溃无存。率军征战的刘锦棠上奏清政府说：“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5]

那么，清政府如何才能在新疆恢复其统治秩序呢？旧的制度已经荡然无存了，后面将采取何种管理制度才能给新疆带来长治久安呢？

三、建省的实现

光绪三年（1877），清军在收复新疆的节节胜利之时，朝廷便给左宗棠发出了谕旨，要他通盘考虑新疆今后工作筹划。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建议也便在这个时候正式向清政府提了出来。

其实，左宗棠对新疆建省早就有了思考。而这一思考也并非是在钦命收复新疆之时。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仅22岁的左宗棠赴京赶考会试，适逢浩罕屡次唆使和卓后裔侵入新疆之时，边境烽火频传。左宗棠会试不第，但又有感于西陲的不宁，便赋诗一首：“西域环兵不记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磧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6]由此可见，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想法，仅比长龄提出在南疆添置文官的建议晚了一年。道光三十年（1850）1月2-3日，因病开缺回乡途径贵州、湖南的林则徐时与左宗棠在岳麓山下的长江边上彻夜长谈。临别时，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有关新疆地理方面的数据资料，战守攻以及俄国在边境地区的政治、军事动态等宝贵资料都交给了左宗棠，并说：“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及后来督办新疆军务时的光绪元年（1875），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又提起了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7]所以当光绪三年六月（1877年7月），清政府征求他对新疆工作的筹划看法时，他不出一个月便完成了上奏清廷《遵旨统筹全局折》，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立行省的建议。

左宗棠在奏折中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还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指臂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最后，他说：“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8]左宗棠说，建省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而定。而且他还从保卫西北边陲的伟大意义来说，新疆建省已是客观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半年后，左宗棠再一次上奏清廷阐述关于新疆建省问题。

左宗棠两次奏请，清政府均迟迟没有回复，毕竟新疆建省涉及到清政府在新疆统治体制的重大改革。直到光绪四年九月（1878年10月），才在一份上谕中提出了一连串问题，“郡县制以民为本……除旧有各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尚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9]清廷命令左宗棠提供一个完全之策。

光绪四年（1878）十月，左宗棠即上了《复陈新疆情形折》。左宗棠在奏折中说，目前清廷

在新疆施行的只管军事不理民事的军府制，在新疆已经本行不通了，南疆的民政事务借由本民族的王公伯克治理，势必造成“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知怨其所管头目。”若将民政事务“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道实基于此”^[10]。况且，南疆刚刚收复，经过招纳流民，兴修水利，安置流民在各地垦荒种植，“即以目前论之，亦非无可治之民”^[11]。更何况，平定、收复新疆之后在各城设立的善后局已经接管了以前多属于王公伯克权力范围内的事务。“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12]。左宗棠提醒清廷，新疆建省机不可失。

左宗棠从维护清政府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终于引起了清政府高层的重视。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清廷在一份上谕中说：“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创始……刻下伊犁未经收回，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13]从中可见，清廷既然已经认可了新疆建省这件事，但是又以伊犁尚未收回为由尚未最后决定。

清廷在新疆建省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满清政府中相当多的王公贵族对权力转移，甚至衰弱的不满。新疆建省之前，按照清代的制度，新疆施行的还是军府制，出任伊犁将军、参赞、领队及办事大臣的一律是满清贵胄，汉族官员不得涉足和染指。但设立行省，改设郡县以后，从省府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就不得不由汉族官员出任了，对于这种权力的转移，多数清政府官员自然是心有不甘的。随着新疆各个县城的逐步被收复，很多军中官员也都逐渐转入了地方善后局，事实上已掌握着新疆各地的统治权。这些情况也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作出比较现实的决策。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伊犁收回后的光绪八年（1882），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新任新疆督办军务的刘锦棠以及已经就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都分别再次上奏清廷，将新疆建省问题提了出来。当然这一次的提出，已经使新疆建省从讨论建省进入到了实质性的操作层面上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各省的地方长官成为巡抚，总揽一省的军政要务，总督为地方的最高长官，或管一省或管二三省。依照左宗棠最初的方案是，新疆并设总督、巡抚，此想法与龚自珍想法一样。新疆设巡抚，则受陕甘总督的节制；新疆设总督，便不再隶属于陕甘总督的管辖。同年四月，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清廷在提到新疆建省时说，新疆的镇迪道早已恢复，伊犁人后锐减，不必要委任更多官吏，只有南疆各城要请刘锦棠“分别地方广狭繁减，设立丞倅、牧令等官”，“如果地方日益富庶，然后递设督抚以统辖之”^[14]。谭钟麟的意见是要等到“地方富庶”了再行“递设督抚”事宜，实际上是推迟新疆建省的时间。这是他不愿意放弃对新疆建省的管辖而已。

三个月后，刘锦棠上奏清廷，提出了自己的新疆建省方案。他在奏折中说：省会设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三道：镇迪道，将甘肃省镇迪道所辖各州县及甘肃省安肃道所属哈密合并建成；阿克苏道，辖阿克苏、哈喇沙尔（今焉耆）、库车、乌什等原东四城各地组成；喀什噶尔道，下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和田等原西四城各地组成。道以下各设府、州、厅、县，伊犁仍设伊犁将军，仅管伊犁、塔城两处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塔城增设副都统一员。显然，刘锦棠是想处理好与满清亲贵，现任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另外一点，刘锦棠不建议新疆独立建省，而主张将新疆与甘肃联在一起考虑。鉴于新疆远离内地，若没有内地通过河西走廊的支援，新疆将孤立难存。当然，这也照顾到了陕甘总督谭钟麟。之后，左宗棠又上奏清廷，坚持新疆督抚并设的主张。但最终，清廷还是采纳了刘锦棠的新疆建省方案。

光绪九年（1883），刘锦棠奉旨委任了南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其中所遇到的阻力也不小。用刘锦棠的话说，就是“因有一处之妨而致疑全局之多碍，因有一端之阻而动谓众务之未宜”^[15]。直到光绪十年（1884）十月，各方筹备都已妥当之后，户部才迟迟奏请清廷添设新疆巡抚和新疆布政使。不久，清廷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甘肃布政使魏光焘调任新疆布政使。

至此，新疆建省已成为事实。由于沙俄数年间先后割占侵吞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 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全疆的行政中心不得不从伊犁移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后，又经过刘锦棠及其后任者陶模、饶应祺、潘效苏等的不断调整、增设，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全疆共建四道，下辖 6 个府、10 个厅、3 个州、23 个县与分县。阿勒泰作为一个道并入新疆。那是后来辛亥革命后满清灭亡，民国八年（1919）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发生的事情了。

四、深远意义

清军收复新疆后，面临的是大战之后的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就的体制已荡然无存。刘锦棠所率领的清军在收复的南疆各城马上成立了一个个善后局。善后局安置流民返回家园，以尽快社会、经济秩序。这在当时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刘锦棠采取的这些善后措施，是依据内地各省郡县惯常使用的办法，对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很好效果。这在当时的新疆是没有前例可以效仿的，后来清政府也认可了这种善后措施，使得这些善后办法得以继续执行。这些措施一方面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非常符合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利益。

那么新疆建省又具有怎样的划时代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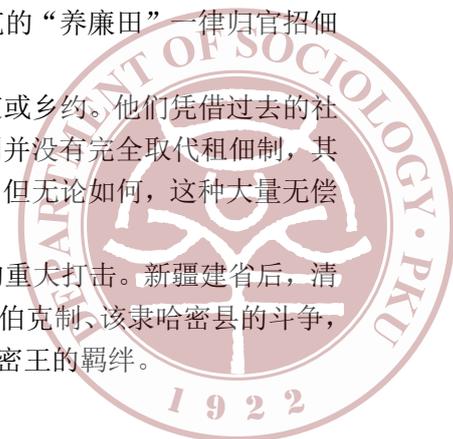
第一，取消了伯克制度。伯克制度是清代在新疆维吾尔人中实行的一种官职。自乾隆统一新疆以来，在新疆实行的军府制制度，即由伊犁将军统管新疆的军事，而将其他民政事务则委托给当地的伯克去管理。清政府一方面维护着伯克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比如严格限制了他们所拥有土地甚至农奴的数量。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伯克们随意的圈占土地，盲目的驱使农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的急剧恶化。那彦成、长龄等清代官员曾上奏清廷，要求严格限制伯克的权力，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以维护清政府在新疆的“长治久安”。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再次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伯克的品级都非常高，甚至高于道、府、厅、州、县的官吏的品级。一个县的知事的品级与最低一级的伯克品级相当。刘锦棠屡次上奏清廷，可以保留伯克的顶戴，但不得干预政务。伯克的品级过高已经成为推行郡县制的一个严重障碍。

王公伯克对农民的徭役制剥削与经济压榨，遭到维吾尔农民的激烈反抗。同治三年（1864）由陕甘引起的农民起义蔓延至新疆库车，进而迅速席卷南疆，对伯克体制进行了最猛烈的冲击。伯克体制也奄奄一息，名存实亡。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过程中，收复南疆各城后，希望能找到伯克来帮助处理善后事宜竟然找不到人。为此，刘锦棠请示左宗棠，希望将吐鲁番地区的额敏和卓调赴南疆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左宗棠否决了刘锦棠的想法，他说，伯克应该受善后局的委派，只准其催收钱粮，不准干预公务，伯克的职权大为削弱。先前总揽一方要务，独霸一方的伯克，如今只沦为听命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乡绅。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未恢复伯克的职权，让其坐享农民起义的成果。在伊塔道建立的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正式批准将“所有伯克名目全行裁汰”。^[16]由此，伯克制终于完成其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前分配给伯克作为俸禄的“养廉田”，是由农民耕作的，收货皆归伯克所有。战乱过后，这些土地皆由农民占有耕种。随着伯克制的取消，清政府也宣布伯克的“养廉田”一律归官招佃承租。伯克的农奴也变成了租地耕种照章纳粮的佃户。

伯克制取消后，清政府依旧将以前的伯克委任为各级衙门的书吏或乡约。他们凭借过去的社会地位和新的权势，迅速转化为了地主，依然骑在农民头上。徭役制并没有完全取代租佃制，其同收获物的分成制结合在了一起，依然统治者广大维吾尔农村社会。但无论如何，这种大量无偿的劳役分成制与过去单一的徭役制相比，总是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比，哈密郡王在世袭领地内的统治并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新疆建省后，清政府依然维持着对维吾尔农民的徭役制剥削制度。哈密农民要求取消伯克制、该隶哈密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民国二十年（1931），草扯第摆脱了哈密王的羁绊。



第二，恢复经济。清政府收复新疆后，面对一切破败景象，首先是想办法采取怎样的措施，尽快恢复凋敝的经济。刘锦棠等除了逐步取消各级伯克干预政务的问题，其次就是着手改革田赋制度。清代的田赋是地丁合一，每亩征收的。而在新疆却是“按丁索赋”，即把赋役摊到每个人头上。这样一来结果就是“富户丁少赋役轻，贫户丁多赋役重”^{〔17〕}。于是，刘锦棠把内地实行的“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推行到新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次，是改革屯垦制度。清代一向是非常重视新疆屯田。屯田在新疆分为民屯、回屯、旗屯、兵屯、犯屯等。其中民屯的待遇较优，兵屯、犯屯则受累较重。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奏请将各地营勇汰弱留强，所裁兵勇“就各兵驻防之所，如有荒地可拨，为之酌数分给，即同己业。”^{〔18〕}将耕地分给屯兵，用以激发屯兵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犯屯，刘锦棠也仿照民屯，给他们提供牛、种子、房屋、农具、口粮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民屯给予“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征”。^{〔19〕}第三是改革新疆的采矿业。清代以前在新疆挖金采铜铸币，采取的是摊派方式，即强迫农民进山采矿冶炼。收复新疆后，因为人力短缺，摊派差徭遭到农民的坚决抵制。于是，刘锦棠不得不采取各矿“听民开采，纳课归官”^{〔20〕}。由此，采矿业由摊派差徭向课税方式过渡。

第三，取消了内地人民向新疆移民的认为障碍。鉴于新疆经济亟待恢复，需要内地大量的人力。清政府通令各省将无地的农民迁往新疆从事农垦。19世纪最后5年，内地农民成批迁往新疆。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西宁回民携眷迁往新疆伊犁绥定（今霍城）^{〔21〕}次年，西宁回民刘同春起义失败，数千人迁往新疆罗布淖尔（今尉犁）、卡克里克（今若羌一带）^{〔22〕}此后，又有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逃难来新疆谋生的人口是“几于盈千累万”^{〔23〕}，大都被安排在镇迪、伊塔两道种地。这当中至于零星来疆经商定居于此的人就更多了，因为新疆建省，将原先阻碍内地移民迁往新疆的限制政策取消了。

在迁往新疆谋生的这些人当中，自然也有很多的技术人才。加之左宗棠就是一个经营农桑的行家里手。他在收复新疆的时候，就酝酿着如何发展新疆的农业、采桑业。新疆收复后，他先后从江浙一带招募了一些养蚕、织绸技工来到新疆和田，推广新疆的养蚕、织绸技术。南疆很多地方为此还设立了蚕桑局，发展当地的蚕桑业。

在大量的移民迁居过程中，新疆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也密切了起来。这一点，从湖北武昌起义与新疆辛亥革命的爆发时间上即可以看出来。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迪化、伊犁也很快爆发了起义。而且，在新疆的革命党人也挫败了清保皇党人欲拥宣统皇帝西迁的企图，促使了清王朝的垮台。清王朝的垮台，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新疆建省，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的联在了一起，新疆人民也能够紧跟内地的时代发展步伐，共同见证并践行者时代前进的步伐。

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居新疆，也充实了西北边疆的防卫力量。沙皇俄国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其蚕食手段就是在新疆偏远地方建立定居点，形成堡垒，伺机侵吞。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居新疆，逐步巩固了新疆的边防。因此，移民实边，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新疆捍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后背力量。

新疆省的建立，对新疆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新疆省的建立，它客观上既符合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也对中央王朝加强其统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新疆各族人民亦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注释：

〔1〕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2〕〔3〕〔4〕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5〕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6〕〔7〕〔8〕〔9〕〔10〕〔11〕〔12〕〔13〕〔14〕纪大椿著，《新疆近代史论文选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